

中国农民工流动机理的理论探索

吴兴陆 开名杰 冯宪

【摘要】 文章在评述国际上人口迁移机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对经典人口流动机理理论的修正,并通过对浙江省农民工流动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各种因素,重点分析了经济动因对农民工流动形成的内在机理。

【关键词】 农民工 流动机理 实证研究

【作者】 吴兴陆 浙江省嘉兴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开名杰 浙江省嘉兴学院现代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冯宪 浙江省嘉兴学院人力管理系,副教授。

一、对城乡人口流动经典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城乡人口流动的经典理论,对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动力机制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这些理论难以完整地解释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机理。

(一)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到托达罗的推拉模型

刘易斯(A. Lewis, 1989)把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其不同的劳动边际效益率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告完成。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了过度损害农业而发展工业的情况,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同时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刘易斯的模型经费景汉与拉尼斯的补充和修正,被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杨宜勇, 2000)。在这一模型中建立了两点假设,一是农村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二是现代部门的成长无限地吸收剩余劳动力。

这一模型和假设,显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并没有使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也没有使浙江省经济进入一元经济。根据对1995年、2002年中国及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中国及浙江省城乡收入差分别从1995年的2.47和2.10上升到2002年的3.11和2.37,随着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加,呈现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原因在于现代部门的发展并不是仅仅通过对劳动力的吸收而实现的。

基于“刘易斯—费—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的假设前提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符,托达罗(M. Todaro)在1971年又提出了城乡人口流动的动态均衡模型(托达罗, 1991)。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对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面临的失业风险的权衡。他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

托达罗认为人口迁移是城乡预期收入差造成的,人们可以通过迁移改善生活条件。于是,流入流出地那些有利于和不利于移民生活改善的社会经济因素就成为人口迁移的拉力和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城乡双向拉力、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托达罗模型可导出下式:

$$M = f(W\pi - Q) = f[W, N/(S - N) - Q] = f[W(g - p)n/u - Q], f' > 0 \quad (1)$$

式中: M 为农村人口流出量, W 为城市实际收入, π 为在城市得到工作的概率, Q 为农村实际收入, $\gamma = g - p$ 城市新工作创造率, g 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P 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N 为城市就业人数, S 为城市总劳动力数, $n = N/S$ 为城市就业率, $u = (S - N)/S$ 为城市失业率。

从(1)式中可以看到,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量取决于城市实际工资、农村实际收入、城市经济增长率、城市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城市就业率与失业率的比值等因素。

托达罗进一步认为, 农村劳动力进城尽管不会很快找到工作, 但在城里呆的时间越长, 其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所以人口流动行为模式应该建立在较长时间范围的基础上。

设 $V(0)$ 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的净贴现值, W_t 、 Q_t 分别代表 t 期城市和农村的实际工资, π_t 表示迁移者在 t 期获得工作的概率, $C(0)$ 表示迁移成本。 n 代表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 r 表示贴现率, 则有公式:

$$M = f[V(0)] = f\left[\int_0^n (W_t \pi_t - Q_t) e^{-rt} dt - c(0)\right], \quad f' > 0 \quad (2)$$

若 $V(0) > 0$, 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 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 若 $V(0) < 0$, 则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 甚至从城市倒流入乡村。托达罗认为, 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人数猛增, 这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扩大的结果。城市就业机会越多, 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越大, 迁移到城市的人口越多, 城市失业水平越高, 所以创造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从托达罗模型和基本思想不难看出, 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城市经济的增长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规模猛增的主要原因。为了研究这些因素影响力的大小, 我们运用浙江省的相关数据进行浙江省农村人口流动的线性回归分析(见表1、表2)。

表1 浙江省历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规模与影响因素的数量关系

年份	M	W	Q	d' = W - Q	g	p	G	n/u	u
1991	186.88	2143	1211	932	17.8	24.11	837	49.00	2.0
1992	184.18	2619	1359	1260	19.0	26.27	1102	40.66	2.4
1993	219.43	3626	1746	1880	22.0	32.05	1592	37.46	2.6
1994	224.03	5066	2225	2841	20.0	24.27	2223	37.46	2.6
1995	228.82	6221	2966	3255	16.7	23.01	2965	34.71	2.8
1996	243.61	6956	3463	3493	12.7	21.69	3537	37.46	2.6
1997	259.96	7359	3684	3675	11.1	14.41	4001	32.33	3.0
1998	268.05	7837	3815	4022	10.1	21.53	4356	29.30	3.3
1999	278.43	8428	3948	4480	10.0	26.14	4733	28.41	3.4
2000	367.51	9279	4254	5025	11.0	16.64	5372	28.41	3.4
2001	346.36	10465	4582	5883	10.5	5.92	6053	26.03	3.7
2002		11716	4940	6776	12.3				

注: M 为各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 W 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Q 为农村人均纯收入, g 为浙江省 GDP 增长率, p 为浙江省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G 为第二第三产业 GDP 值, n/u 为城镇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之比。

资料来源:《2002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02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通过分别对城乡收入差(d^1)、全省第二、三产业国民生产总值(G) (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量与城市经济发展关系)、就业率/失业率(n/u) 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 回归式之一: $M = 137.1 + 0.35d^1$, 显示浙江省农民工流动结果的实证分析与托达罗模型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 农村人口流出量

表2 浙江省历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规模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影响因素	城乡收入差	第二第三产业 GDP 值	就业率与失业率比	城市登记失业率
相关系数	0.928	0.933	-0.842	0.947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1	0.000

注: 根据表1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所得。

与城乡收入差成正比。回归式之二： $M = 150.1 + 0.031G$ ，显示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促进农村向城市移民有较强的贡献，这一点与托达罗模型所表达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回归式之三： $M = 511.7 - 7.412(n/u)$ ，显示城市的就业率/失业率特别是失业率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影响，与托达罗的观点不符合。

这一相悖的结论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分析所用的就业率/失业率比值是采用《浙江省统计年鉴》中城镇登记失业率，没有包含农民工的失业；(2)城镇人口和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和岗位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城镇人口失业率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业机会的减少，城里人不愿从事的以“脏、累、苦、险”为特征的行业和岗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稳定的岗位需求，另外，城市原有劳动力结构老化也使城市对以青壮年为主的外来劳动力需求加大；(3)由于政府的促进就业政策，使就业机会增加，也将吸引大量的农民工，增加城市劳动力的供给。

(二)托达罗模型的缺陷修正及其发展

托达罗模型对研究当前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机理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应该看到的是，托达罗模型也确实存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假设和论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该模型假定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必定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即便找不到工作，他们也宁愿在城市里做些临时性工作或暂时赋闲。而在中国，由于农村还保留着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屏障，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一般会返回农村；也有的农民工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在城市赚到一些钱后，又返回到农村重新创业；另外，为了收入最大化，有些农民工会采取“候鸟式迁移”的流动方式。故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并非仅仅是单向的从农村流向城市，还包括逆向的从城市返回农村，其动力因素也就不仅仅包括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实际上还存在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

分析托达罗模型中公式(2)是有问题的，它只考虑到了扣除迁移费用 $C(0)$ ，没有考虑到迁移者在城市的生活费用，或者说托达罗把迁移者看成是不考虑成本的非理性人，如果考虑迁移者的生活费用 C' ， $C_i' = C_1' + C_2' + \dots + C_t'$ ，则公式(2)中 $V(0)$ 应该为：

$$V(0) = \int_0^n (W_t \pi_t - Q_t) e^{-rt} dt - C(0) - \sum_{t=1}^t C_t' (1+r)^{-t} \quad (3)$$

其中， C_t' 表示迁移者在第 t 期的生活费用， r 表示贴现率。由公式(3)可知，迁移者在城市里呆的时间越长，获得职业的概率也就越大，而在城市里的生活消费总费用也越多，从而减少甚至抵消了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从农村迁往城市的劳动力也会大大减少。

2. 托达罗认为农村人口的流入加剧了城市的失业，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不断增长，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许多传统行业如建筑业、餐饮业等，由于劳动条件差，城市劳动者不愿意从事这些工作。而农民工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只能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作。因此，他们并没有抢夺城市居民的工作机会，而且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服务业与原有城市人口从事的服务业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3. 托达罗只看到了农业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降低了迁移人口的预期收入差异，从而减少了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数量，而没有看到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广大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同时也会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改善城乡就业状况。因此，不必担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会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

为此，中国学者周天勇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正(周天勇，2001)。他首先在模型中引入时间长度，将收入差异分析微观个人化，提出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反的政策解释。认为一个农村劳动力在外出的一年中，其能找到工作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月或两个月，甚至全年，这就意味着，单个从农村流入城

市的劳动力虽然在城市中不可能找到能出满勤的工作岗位,但是,他有可能或断或续找到能工作几个月的岗位,这样 π 的概率不再由托达罗所描述的因素确定,而是决定于流入城市找到不同时间长度工作的劳动力与从农村流入城市总的劳动力之比。这样公式(1)中的城乡预期收入差 d 改为 d^1 : $d^1 = W\pi^1 - Q > d = W\pi - Q$, d^1 为修正后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差,它要比托达罗分析的 d 大。其次,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其就业有一个对应的行业结构,这就是说上式中,城市每一个不同行业,其 π^1 值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行业可能几乎等于0,有的行业由于城市劳动力不愿意从事,而几乎为1, π^1 值越高,在这个行业中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对城市就业影响就越小。因此,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并不影响城市人口就业。其三,托达罗模型中的农村实际收入 Q 用外出务工的放弃收入即机会成本 C 代替更为合理。从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预期收益 $d^1 = W\pi^1 - C$ 。这表明,机会成本越小,则城市的预期收益 d^1 越高。如果把农民收入看成是农民全年满负荷工作时间比率和全年满负荷工作的收入水平的乘积,由于农业现代化手段的运用,中国农民全年实际工作时间比率一般低于30%,浙江等人多地少的地区甚至低于10%;一个家庭中的一个或几个劳动力外出并不会影响其家庭收入。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农民工外出务工,也不会带来农业生产的损失,即机会成本很低或为零。因而,托达罗模型的公式(1)修正为: $M(t) = f(W\pi^1 - C)$, $f' > 0$,式中的含义是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能就业的概率 π^1 值要比托达罗分析的 π 值高,并且其放弃的收入 C 要比 Q 低得多。因此,到城市的预期收入差 d^1 也要比托达罗分析的 d 高。劳动力资源从收益低的部门向收益高的部门转移,是一种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它带来两个结果:收入差距会引起劳动力流动,而劳动力流动会平衡收入差距;由于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修正后的模型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客观规律。

二、农民工流动的经济动因的实证分析

托达罗模型的基点是人口流动的决策在于人们对收入的预期。从经济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差距逐渐扩大,从而形成了对农村劳动力巨大的拉力;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业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农村劳动力的推力也不断增大,从而形成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大量涌现和城市“苦、脏、累、险”等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提供了接纳条件(张正河、谭向勇,1999),从而形成了多年来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现象。

本文所用的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2002和2003年所组织的浙江省农民流动意愿问卷调查^①。

(一)从全国和浙江省的情况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1997~2002年,由于市场疲软、结构调整、旱涝灾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年下降。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也在成比例的增长(见表3)。另外,从浙江省城乡收入差与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相关关系分析(见表2)可知,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数量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增大是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外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流入

由于浙江省农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过于密集的人力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了传统的外出

^① 问卷调查包括:(1)2002年采用入户访谈方式和在浙江省范围内随机调查的方式,完成有效问卷430份,(2)在2003年在省范围采取调查员面对面访谈方式,完成有效问卷522份,合计952份。以下统称农民工流动意愿调查。

经商的习惯,这些都成为浙江省农村人口外流的动力。因此,浙江省也是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最早流动的高迁出的省份之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浙江省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其他省份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差距迅速拉大,造成迁移的“经济势差”大。从浙江省 2002 年部分经济指标在全国排名情况来看:人均 GDP 为 16 570 元/人·年,在全国排名第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 716 元/人·年,在全国排名第三;农村人均纯收入 4 940 元/人·年,排名第四,使浙江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从一个人口流出大省转变为农民工的流入大省之一(见表 4)。

表 3 1995~2002 年全国城乡居民年收入情况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农村人均纯收入(元)	1577.7	1926.1	2090.1	2162.0	2210.3	2253.0	2366.0	2476.0
人均纯收入增幅(%)		9.0	4.6	4.3	3.8	2.1	4.2	4.8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283.0	4838.9	5160.3	5425.1	5854.0	6280	6860	7703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2.51	2.46	2.51	2.64	2.79	2.90	3.11
城乡居民收入比	2.71	3.8	3.4	5.8	9.3	6.4	8.5	13.4
转移量(万人):								
全国			8305	9537	10107	11329	8961	9400
浙江省	229	244	260	268	278	368	346	

注:表中数据主要根据 1995~2002 年浙江省和中国统计公报数据整理得到;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关于中国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状况报告》,2000 年,其中 2001、2002 年数据来自于农业部外出就业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

(三)从浙江省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实证分析来看,经济因素为主要动因

为了深入研究浙江省农民工流动的内在动力,本课题组在浙江省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对农民工的流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

1. 城市的推力和拉力。问卷调查设计

了“城市最吸引你的原因”和“你打工中最不满意的地方”等多项选择题,作为城市对农民工推拉的因素。从调查结果看,“城市工作挣钱多”位居第一位,这是最直接的经济动因;而位居第二、三、四位的分别是“城市有更多发展机会”、“城市就业机会多”、“想出来学技术”,都与经济收入有着近期或远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表明经济收入是首要动力。而城市推力中,“生活费用高”排在第一位;如果把“经济收入没有达到预期”与“生活费用高”两项合计则为 26.2%,大大高于其他因素(见表 5)。

2. 农村的推力和拉力。问卷把“外出务工的初衷”和“不愿在城市定居返回农村的理由”多选题作为调查农村推力和拉力的选项,结果表明,位居第一位的因素是“人多地少,收入少”,这与“城市工作挣钱多”实际是一回事,表示经济收入是第一位因素(见表 6)。对比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前后的收入(见表 7),结果显示,农民工

表 4 浙江省各年份流动人口状况 万人

年 份	1982	1990	1995	1997	2000
外来流动人口	21.00	72.77	109.84	200.00	1013.26
外出流动人口	25.14	142.23	118.98	300.00	826.46

资料来源:《跨世纪的中国人口》(浙江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年;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199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浙江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年。

表 5 城市对农民工的推力和拉力分析 %

城市对农民工拉力因素			城市对农民工推力因素		
城市最吸引你的主要原因	比例	排位	你打工中最不满意的地方	比例	排位
城市工作挣钱多	24.3	1	生活费用高	16.2	1
城市有更多发展机会	18.4	2	工作难找	11.8	2
城市就业机会多	16.5	3	与家人分离,难照顾家庭	11.7	3
想出来学技术	11.7	4	居住条件差	10.8	4
向往城市生活	10.2	5	经济收入没有达到预期	10.0	5
为今后子女成长发展打基础	8.3	6	受人歧视	7.4	6
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7.1	7	权益缺乏保障	6.4	7
其他	3.5		社会地位低	5.8	8
			其他	20.1	

注:城市推力因素中的其他项包括:工作性质及环境差占 5.7%;城市人际关系淡薄难以沟通占 5.4%;子女教育费用高、入学难占 4.8%;政府的限制政策等占 4.2%。

资料来源:2003 年浙江省农民工流动意愿调查。

外出打工前后的收入差距是非常显著的。

究竟农村推力大一些还是城市拉力大一些?调查显示,农村占第一位的推力是“人多地少,收入少”,而城市拉力中占第一的是“城市工作挣钱多”,前者较后者高3.5%。同时,考虑到城市对农民工的种种限制政策和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因素,在中国现实状况下,城市对农民工不仅仅是拉力,推力也不可忽视(李强,2003)。与此同时,农村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却十分弱小。因此,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两种力量相权衡,农村中的推力大于城市的拉力。

表6 农村对农民工的推力和拉力分析

农村对农民工向外的推力			农村对农民工的拉力		
农民外出打工的初衷	比例	排位	不愿在城市定居返回农村的理由	比例	排位
人多地少,收入少	27.8	1	与家人分离,难照顾家庭	31.6	1
农村太苦,农活太累	15.9	2	老家生活费低,人际关系融洽	26.9	2
老家没有前途	15.8	3	在老家社会地位高,有自我满足感	15.6	3
在老家没有活可干	13.8	4	农村有土地,不愿放弃	14.2	4
农村无法学到技术	12.0	5	老家发展快,机会多	10.8	5
农村缺乏文化生活	7.9	6	其他	0.9	6
其他	6.8	7			

资料来源:2003年浙江省农民工流动意愿调查。

表7 调查对象外出打工前后的年收入状况

外出打工前在家年收入状况			外出打工年收入状况		
收入水平	样本数	比例(%)	收入水平	样本数	比例(%)
5000元以下	398	76.24	5000元以下	99	18.97
5000~7000元	70	13.41	5000~7000元	84	16.01
7000~9000元	22	4.22	7000~9000元	106	20.36
9000~12000元	15	2.87	9000~12000元	126	24.11
12000及以上元	17	3.26	12000及以上元	107	20.55
总计	522	100	总计	522	100

资料来源:2003年浙江省农民工流动意愿调查。

表8 浙江省进城农民工发生的各种费用

项目	年交通费		政府性收费		年生活费		子女教育费		年结余	
	区间	比例	区间	比例	区间	比例	区间	比例	区间	比例
费用区间	0.2内	16.0	0.2内	26.6	0.5内	4.2	1.0内	7.8	0.1	2.5
及各区间所占比例	0.2~0.4	24.9	0.2~0.4	26.6	0.5~1.0	6.3	1.0~2.0	48.4	1.0~2.0	16.0
	0.4~0.6	18.8	0.4~0.6	11.9	1.0~2.0	13.0	2.0~3.0	9.3	2.0~3.0	14.0
	0.6~0.8	7.2	0.6~0.8	3.7	2.0~3.0	13.5	3.0~5.0	12.5	3.0~5.0	22.7
	0.8~1.0	17.1	0.8~1.0	7.3	3.0~4.0	18.2	5.0~8.0	7.8	5.0~7.0	10.4
	1.0~1.5	3.9	1.0~1.5	4.6	4.0~6.0	19.8	>8.0	14.1	7.0~9.0	6.7
	1.5~2.0	5.0	1.5~2.0	5.5	6.0~10.0	18.7			9.0~15.0	18.4
	>2.0	7.2	>2.0	13.8	>10.0	6.3			>15.0	9.2
均值	0.633		0.645		4.137		2.517		5.511	

注:根据2002年浙江省农民工流动意愿调查数据整理。

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转移成本的各项内容,对农民工流动决策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其一,流动首先要发生迁移成本,若农民工不能支付迁移成本,则这种流动就不会发生。已有的研究指出,在一些极端贫困的边远地区,农民流动的能力很小,流动规模也相应较小,其原因是无力支付迁移成本。其二,农民进城后要发生就业成本、风险成本和生活费用。从目前情况看,农民工若在城市找到工作,大都能负担自身基本生活费用,但就业不稳定或面临意外困难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由于农民工是风险承

(四)迁移成本也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经济因素

农民就地或异地向非农产业转移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农民个体在选择迁移方式时,必然要考虑迁移成本(乔润令,2002)。单从成本角度分析,不离乡型迁移成本很低。而离乡型迁移需要付出高得多的迁移成本。

我们对农民工进城后的各种费用进行了调查分析(见表8),结果显示,年均生活费最高,占年结余5511元的75.1%,其次是子女教育费、政府收取费用。

受能力很低的弱势群体,在其个人面临生存危机的同时,对城市社会的种种不利影响也最容易产生。因此,不论从促进农民工流动还是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降低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成本和就业风险,都是我们设计政策的出发点之一。其三,农民工若希望举家迁入城市定居,则要面临数额巨大的安家费用。对于大多数素质不高、在城市缺乏基础、只靠从事粗重活计挣一份微薄收入的农民工来说,积累全家在城市生活必要的经济基础并不容易。因此,降低农民工的安家费用也可以促进农民工迁移。显然,由于不离乡型转移的成本具有明显优势(黎民,1997),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农民很自然地选择不离乡型的转移方式。从浙江省的情况看,农民选择不离乡型转移比例远大于离乡型转移(见表9)。

表9 浙江省历年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和外出劳动力情况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从事第二三产业占全部劳动力比例	39.4	43.7	46.7	53.4	50.3	50.8	45.8	44.9	46.7	51.1	53.4
外出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例	9.0	8.8	10.4	11.1	10.9	11.6	12.4	12.8	13.3	17.4	16.0

虽然说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中的迁移成本是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农民在选择转移方式和转移去向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转移成本与转移收益进行比较。

从就业空间来说,不离乡型转移可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其就业空间直接受居住地资源条件限制。东部各省农村,由于乡镇企业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实现了不离乡型转移,因而外出打工的人数少;而在中西部地区农村,乡镇企业不够发达,离乡型迁移成为主要方式。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六五”时期,乡镇企业劳动力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688万人;而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仅增加90多万人。另据《浙江省统计年鉴》显示,2001年在省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9.2%安置在本乡乡镇企业就业,比上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因此,离乡型转移将成为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

从收入水平来看,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城市高于乡村,沿海高于内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格局,决定了离乡型迁移的收入大都高于不离乡型转移的收入,向发达地区迁移的收入在总体上高于向欠发达地区迁移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离乡型迁移需要支付高得多的成本,但高收入的预期,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更倾向于向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对浙江省农民工流动的实证分析,不难看出,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是促使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主要动因。将中国农民工流动机理与经典人口迁移理论相对比,反映了两者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而这正是制定人口流动相关制度和政策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1989):《三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2. 托达罗(1991):《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杨宜勇等(2000):《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中国经济出版社。
4. 黎民(1997):《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问题探讨》,《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5. 张正河、谭向勇(1999):《论中国乡城人口迁移》,《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
6. 乔润令(2002):《农民进城的“市场门槛”有多高》,《中国改革》,第1期。
7. 李强(2003):《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8. 周天勇(2001):《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经济研究》,第3期。

(责任编辑: 朱 犁)